



实录研究书系

中国已佚实录研究

The Study of China's Lost Memoir

谢贵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实录研究书系

中国已佚实录研究

The Study of China's Lost Memoir

谢贵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已佚实录研究 / 谢贵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0

(实录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5325 - 6911 - 3

I. ①中… II. ①谢…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369 号

实录研究书系

中国已佚实录研究

谢贵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75 插页 2 字数 486,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 - 7 - 5325 - 6911 - 3

K · 1744 定价: 9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实录与已佚实录	1
二、学界研究实录的既有成果	3
三、实录起源问题探寻	7
四、实录在目录学上的分类及其地位的升沉	11
五、已佚实录佚于何时	17
六、“实录”非帝专有但颇欲垄断	24
七、“实录体”体裁的确立	29
八、古代实录的价值与功能	42
第一章 十六国南北朝实录研究	47
第一节 北方实录辨析	47
第二节 南朝萧梁:实录体的正源	49
第二章 唐实录研究(上)	54
第一节 唐实录的修纂制度	54
一、唐实录修纂机构——唐代史馆	54
二、实录修纂的史料保证:唐代其他书史修纂机构与制度	60
三、在外修史制度与唐实录的修纂	65
四、唐代帝王的自省意识与史馆的直书精神	67
五、唐代实录修纂的升赏制度	70
六、唐实录修纂与唐代国史	72

第二节 唐实录的修纂过程	76
一、唐高祖与唐太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76
二、唐高宗与武则天实录的修纂过程	82
三、唐中宗与唐睿宗实录的修纂	90
四、唐玄宗、肃宗与代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95
五、唐德宗、顺宗与宪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102
六、穆宗、敬宗、文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117
七、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122
第三节 唐实录的修纂人员	134
一、唐代前期诸朝实录修纂人员	134
二、唐代中期诸朝实录修纂人员	147
三、唐代后期诸朝实录修纂人员	159
第三章 唐实录研究(下)	171
第四节 唐实录的体裁与体例	171
一、唐实录体裁的编年特征	171
二、唐实录体裁的纪传特征	174
三、编年形式与纪传形式有机整合成唐实录的独特体裁	179
四、档案的融入:唐实录的另一特征	182
五、唐实录的编纂和裁剪特例	183
六、唐代各朝实录并非体例完全统一的著作	189
第五节 唐实录的政治影响与学术价值	190
一、唐实录的政治影响	190
二、唐实录在涉唐史书群落中的重要地位	198
三、唐实录在叙事及考证上的史料价值	214
第六节 唐实录的曲笔与讹误	234
一、唐前期实录的诋诬	234
二、唐中期实录的诬饰	242
三、晚唐党争与实录修纂	245
四、唐实录的无意之误	251
第七节 唐实录的传播与评价	259
一、修纂过程中的传阅和扩散	259
二、修成后的阅读和传播	260

三、唐实录的历代评价	262
第四章 五代十国实录研究	266
第一节 五代十国实录修纂机构	266
一、五代十国修纂机构史馆的设置与运行	266
二、五代十国史馆中的史官设置	270
三、五代十国实录基本成于史馆	271
四、五代十国其他修史机构与制度	274
第二节 五代十国实录的编修体例	276
一、五代十国实录的编纂体例	276
二、五代十国实录中的传记	277
第三节 五代十国实录的修纂过程	281
一、后梁实录	281
二、后唐实录	286
三、后晋实录	294
四、后汉实录	296
五、后周实录	302
六、十国实录	307
第四节 五代十国实录的修纂人员	316
一、后梁实录修纂人员	316
二、后唐实录修纂人员	319
三、后晋实录修纂人员	321
四、后汉实录修纂人员	324
五、后周实录修纂人员	326
六、十国实录修纂人员	328
第五节 五代十国实录的史料价值与历史影响	330
一、五代十国实录是后世修纂五代史的基本史料及依据	330
二、作为史源的五代十国实录对史流的校正作用	332
三、五代十国实录内容的丰富与记事的可靠	333
四、从实录与传闻、野史之间的关系看其史料价值	337
第六节 五代十国实录的失误	340
一、五代十国实录的无意之误	340
二、五代十国实录修纂的讳饰与诬诋	343

三、史源实录之误导致史流之讹	346
第五章 辽夏金元实录研究	349
第一节 辽夏实录	349
一、辽朝修史制度的确立	349
二、辽实录的修纂	351
三、西夏实录	358
第二节 金实录	359
一、金朝修史制度的建立	359
二、金实录的修纂过程(上)	362
三、金实录的修纂过程(下)	371
四、金实录的流传与存佚	378
第三节 元实录	384
一、元朝实录修纂制度的确立	384
二、元实录回归编年体及其原因	390
三、从元太祖至裕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393
四、元顺宗、成宗、武宗、仁宗实录修纂过程	399
五、从元英宗至宁宗实录的修纂过程	404
六、元实录的修纂人员	412
七、元实录的价值	432
余 论	437
参考文献	440
一、史料	440
二、专著	445
三、论文	446
后 记	453

绪 论

一、实录与已佚实录

中华文明有很多重要的历史碎片,或散落在九州大地广袤的土壤深处,或散佚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之中。通过考古,可以挖掘出中国文明的物质碎片;通过考证,可以钩沉出中国文明的精神碎片。无论是考古还是考证,均为复原已经失落或模糊的古典文明,重现中华文化的历史辉煌。物质文明的碎片,比较集中地保存于皇陵之中。号称“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槨之丽、宫馆之盛”的历代皇陵,无疑成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历史见证。然而,在中国,还有另外一种与皇陵类似的历史见证,那便是历代实录。与皇陵专以安置皇帝玄宫为功用相似,实录也专以记录皇帝事迹为己任;与皇陵一帝一陵相同,实录也是一帝一书。如果说皇陵是皇帝死后的归宿的话,那么实录则是皇帝生前的记录。一座座皇陵以其物质形态向我们陈说往古的历史,而一朝朝实录则以文字载体,向我们追诉远逝的文明。通过皇陵的考古,可以找到更多物质文明的碎片用以弥缝破碎的历史;通过实录的考证,则可以发现更多精神文明的碎片以资缀合断裂的体系,从而再现历史的原貌。

历代皇陵以其高大壮观的外形,让人无法回避它的强势存在,并不断探索深藏其中的历史秘密。而以文字为载体的历代实录,则较少受到专学以外的学者们的重视。特别是从萧梁迄元代的列朝实录皆已亡佚,某些人误以为这些实录已无甚价值,更是淡然视之。其实,已佚实录并非烟消云散,杳无踪影,它们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碎片,已散落于经、史、子、集等典籍里面,其史料则分散、渗透、转化和重构于后出史籍当中。本书通过广泛的史料搜集及爬梳、考证,对中国古代已佚实录进行勾勒和探讨,试图弄清列朝实录的修纂过程、修纂人员、内容体例、版本流变诸问题,尽量复原历史真实;同时上下求索,左右勾连,寻绎已佚实录的史料渊源及其流向,从史源学角度对后世纪传体、编年体、典章制度体和纪事本末体等史书之对实录史料

的承继、吸收和转化进行考稽,在此基础上对实录的史料价值、历史影响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评价。

所谓实录,是指创始于萧梁延续至清代的实录体史学形态,是一种以帝王为记载对象和记事核心,以编年体为基础并融合了纪传体等形式的史学体裁,属于“编年附传”体。据南宋陈振孙称,“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①。稍后,晁公武指出:“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氏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近起于唐,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②尽管在起源于唐和备史官采择的实录功用上与笔者观点不同,但认为实录体是综合编年与纪传而成的体裁,则与事实基本相符。谢保成认为,因为实录中附有人物传记,“严格地讲,是不应该称其为编年体的”,“编年部分是实录的主体,人物传部分是随编年部分叙事需要插入的,是实录的辅助内容”。^③简言之,实录体裁的基本特征就是编年附传。

实录一般均为当朝所修的当代史,其成熟的形态是同一王朝的后代皇帝为先帝盖棺定论所修的当代史书。也有少部分实录是当朝皇帝为自己所修的当代历史,或后一个王朝为前朝皇帝所补修的近代史书。自萧梁后,在长达 1400 余年的时段里,历朝历代帝王基本上均修有实录,构成中国官修史学的深厚基础。国史、正史等多以其为修纂的基本史料和素材。故而,实录体史学是官方史料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已佚实录,是指已经散佚的列朝实录,即从萧梁至元代的各朝实录,是与现存实录(主要指明实录与清实录)相对的概念。已佚实录包括萧梁实录、唐实录、五代实录、辽实录、金实录、夏实录、宋实录、元实录。经过无数次天灾人祸,如兵火焚毁和书虫蠹蚀,现存比较完整的实录只有明实录和清实录,从萧梁至蒙元的各朝实录作为体系完备的史书,都已荡然无存。其内容及修史活动的记载,均散落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间,湮没无闻。本著通过史料收集、考证与缀合,力图弄清已佚实录的种种情况。书名《中国已佚实录研究》,盖缘于此。至于宋实录,由于有部分卷帙和附传尚存,加之对它的研究内容甚丰,有必要另书研究,故本书不拟探讨。

本书所探讨的已佚实录中,唯一的例外是《唐顺宗实录》,由于是著名文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起居注·建康实录》。

②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实录类》。

③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学家韩愈所修,被保存在其文集中,免遭毁灭和散佚的命运。此种实录虽然属于现存实录,但处于从梁至元的实录整体亡佚的大背景中,故也附带作为本著的研究对象。

二、学界研究实录的既有成果

由于实录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和史学成就的见证,因此对这些实录的修纂情况及其内容特色诸问题进行考证和勾勒,便成为部分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已有一部分学者对历朝实录进行了研究。仅就本书探讨的已佚实录部分(从萧梁至元朝),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做了前期探讨,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早在20世纪30年代,金毓黻及赵士炜便在《历代实录考略》(《经世》第37期,1939年4月)、《实录考》(《辅仁学志》第5卷,1936年)等文中对列朝实录作了初步的探讨。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仓修良与魏得良《中国史学史简编》(黑龙江出版社1983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等对历代实录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对实录作全面介绍的文章还有倪道善的《古代〈实录〉修纂考》(《山西档案》1999年第3期)、李建宏的《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2期)。对实录作较全面探讨且有心得的还有钱茂伟的《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文。

全面而鸟瞰式的勾勒之外,是学者对历朝实录比较深入的个案探讨,如汪受宽《五凉史家刘昉与实录史体》(《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及《实录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对《敦煌实录》性质作了界定,认为与唐以后的实录同属一类。

唐代实录是研究的重点。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收入《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较早对唐实录的修纂情况进行考述的论文,探讨了实录的起源、唐历朝实录的修纂、晚唐实录的补修、唐实录的作用等问题。赵吕甫《唐代的〈实录〉》(《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也是较早对唐实录进行全面介绍和讨论的论文。孙永如《对唐代实录史料价值的疑议》(《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探讨了唐代实录史料价值的负面因素;他还在《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中认为唐代实录并非是为国史作的准备,并对实录“帝王书”的性质、“兼采编年、纪传之长”的新的特殊体

裁,以及修撰与体制变化的关系作了讨论。岳纯之在《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第五章《实录的修撰》以及所附的几篇文章中,对唐代实录的修纂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其在《唐代史学杂考》(《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中对唐代几部重要史书《大唐创业起居注》、《五代史志》、《晋书》以及《太宗实录》、《文宗实录》的始撰或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订;在《唐代实录散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4期)中对唐代实录的体裁、内容优劣和史学影响作了探讨;在《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中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是唐朝贞观三年(629)才设立的,其撰述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实录的修撰,始于贞观时期,太宗之后,遂形成传统,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要组织人力为自己或前任修撰实录,即使颍运季世亦不例外。王元军《许敬宗篡改唐太宗实录及国史问题探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许敬宗篡改实录提出质疑,但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则对此予以反驳。唐长孺《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载《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考察了唐代宪、穆、敬、文四朝实录的监修宰相和纂修史臣的党派分野,以及此四朝实录的是非褒贬与牛李党争的关系。黄建中在《唐代会昌朝重修〈宪宗实录〉质疑》(《思想战线》1996年第4期)中就唐代会昌朝重修《宪宗实录》的有关问题作了探讨。

《唐顺宗实录》又是唐代《实录》中的研究重点。早在1940年,陈寅恪便对《顺宗实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韩愈之《顺宗实录》者,朝廷史官撰进之国史也。李复言之《续玄怪录》者,江湖举子投献之行卷也。两书之品质绝不类似,然其所纪元和一代,宪宗与阉宦始终隐秘之关系,转可互相发明。”^①以此揭示宦官操控政治和实录的修纂。张国光《今本〈顺宗实录〉非韩愈所作辩》(《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及《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殷都学刊》1985年第3、4期)、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卞孝萱《论顺宗实录的作者》(《历史文献研究》总19辑,2000年),均对《唐顺宗实录》作了讨论。对《唐顺宗实录》进行研究的还有岳纯之、刘真伦等人。岳纯之与崔明德合撰《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从史学和政治的

① 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40年版。

角度对《顺宗实录》的价值和意义作了进一步探讨。在与崔明德的另一篇合撰文章《试释顺宗实录对朝官、宦官的不同态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中,指出《顺宗实录》虽是韩愈所修,但它应是官方史书,反映了唐宪宗的政治态度,其所以对朝官、宦官褒贬不一,是因为在永贞年间的权力斗争中,有的朝官、宦官拥护唐宪宗,有的反对唐宪宗,唐宪宗是那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因此,在尔后编修的《顺宗实录》中,拥护者即受到褒扬,反对者即受到贬斥。刘真伦《韩愈〈顺宗实录〉考实》(《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针对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传世的《顺宗实录》出自韩愈手笔的观点,根据唐代史料和韩愈本人的文集,详细考察了《顺宗实录》的撰修、删削经过以及后代流传的情况,断定详本为韩愈原修本,略本为路随删削本,详、略二本都是韩愈手笔。并以《通鉴考异》等书为线索,在《册府元龟》中勾稽出已经亡逸的详本佚文若干条,以显示详本的原貌及其被删原因。

五代实录的研究成果不多,但郭武雄的研究值得重视。他在《五代史料探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一书中,对《五代实录》的卷帙为何是360卷作了详细的考证,叙述了五代实录修纂的过程,指出传世的五代实录大多保存在《太平御览》与《册府元龟》两部大类书以及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北梦琐言》中,并用实证的方法,作了比对和辨析。房锐循郭武雄之后,也对《北梦琐言》与《五代实录》的关系作了考证(《〈北梦琐言〉与五代实录》,《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谢贵安发表《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二文,对五代的修纂机构与职官制度以及五代实录的修纂过程作了考述。

宋辽金元的实录也有学者做过不少研究。关于宋实录的研究成果,已在《宋实录研究》一书中作了详细叙述,兹不赘述。辽代实录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少。杨军在《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中指出,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赵葆寓、赵光远在《〈海陵庶人实录〉的得失及其对〈金史〉

的影响》(《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中对海陵王实录及其价值作了讨论。孙玉敏在《史学园地的一朵奇葩——〈金实录〉简论》(《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中,对金代的修史制度和金实录的编纂进行了考察,分析了金实录的特点和价值,认为金代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金实录由女真、汉、契丹人共同撰成,金代史家继承了秉笔直书的传统,金实录总体上可看作是保存了时代特点的一部信史。吴凤霞在《女真贵族的史学自觉与金代实录的编纂》(《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中从女真贵族访求祖宗遗事、以史为鉴、参与史书修纂等观念和活动上探讨了其史学意识的自觉和对文明进步的向往。元实录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市村赞次郎《元朝实录及经世大典考》(附录于《蒙古史研究》1932年)对《元史》史料之源的探讨,虽然显得简略和单薄,但开启了元实录修纂的序幕。张帆的《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搜访史料等方面,探讨了元实录的史料之源。温岭《苏天爵与实录》(《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探讨了苏天爵在修元实录中的作用。周雪根《再论苏天爵与实录——与温岭、陈高华、孟繁清等先生商榷》(《长江论坛》2009年第1期)则就苏天爵究竟是修了两部还是三部元代实录,所修的究竟是哪三部实录与前人作了商榷。时培磊《元代实录纂修问题考辨》(《文献》2010年第3期)则对实录纂修中的审查与进呈、未登帝位却修实录、《后妃功臣列传》单独成书三个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此外,萨兆沔《元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指出元翰林国史院在撰修辽、金、宋史和元典章、实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瑞杰《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重视用汉文编修像实录、列传之类的当代史著作作了探讨,认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是翰林国史院,其前身是翰林学士院与国史院。元朝官修汉文当代史的主要成果是元朝实录的编纂,按进呈时间可分类为五朝实录、世祖实录、三朝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四朝实录。

就以上所举而言,前人在中国已佚实录的研究上,做出了不少成绩和贡献,然而,就从梁至元的1100余年间产生的历代实录巨帙来看,这些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首先,目前还没有一部已佚实录研究的专著问世;其次,已佚实录的研究多集中在唐实录,而其他实录的探讨则相对欠缺,五代实录基本上付之缺如。因此,本书将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全面、集中和深入地对从萧梁至元朝的历朝实录加以研究。

对已佚实录领域进行研究,不是本书的首创;对前揭论著所涉问题的探讨及其成果,也不是本书的创见。笔者在已佚实录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对大型古籍《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丛书集成》、二十四史等进行查阅,收集第一手材料,同时利用现代网络和电脑检索手段,对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和《中国基本古籍库》等^①,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罗,将有关历代实录的史料囊括在手,然后逐一进行标点断句,同时进行分类和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成长达150余万字的资料长编,建立了已佚实录研究的强大基础。第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集中几乎全部精力,对历代已佚实录进行不间断的探讨,在前人成果的各个空隙之间,拾遗补阙;对前人未尽之处或明确失误之处进行补充和纠正;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学术空白,则进行填补和初探,发表了一系列已佚实录研究论文。第三,在所有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最终撰成一部长达5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使实录问题的研究整体化和系统化,而系统功能的优点便是系统质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因此本著形成了已佚实录研究领域的某种“规模效应”。

三、实录起源问题探寻

实录体史学究竟起源于何时,学界历来有争论。有“十六国说”(指源于《敦煌实录》),有“萧梁说”,还有“唐代说”。

十六国起源说的创立者是当代学者汪受宽,他在《五凉史家刘昞与实录史体》及《实录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二文中,肯定《敦煌实录》属于实录体的性质,并作了考证和推论。然而,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怀疑和否定,岳纯之《也说敦煌实录》一文认为,《敦煌实录》属于“郡国之书”,“主要记载了敦煌的历史与人物,说它是写西凉史的实录体史书缺乏史料支持”^②。钱茂伟对汪氏观点也持否定态度^③。早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就曾怀疑《敦煌实录》与帝王实录体的本质联系,指出“古以实录名书者,实始于《敦煌实录》”,但李氏政权的开创人李暠“既未尝称帝,昞又以地名书,非如唐宋之实录也”。^④刘知幾更称《敦煌实录》内容“该博”,可以和

① 这些电子版由于技术问题,尚存许多错误,因此本书仅仅作索引和参考。

② 见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70页。

③ 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8页。

《华阳国志》并美^①,暗示此著乃方志之书。笔者也认为此说缺乏更多的证据。根据《太平御览》所引的《敦煌实录》的史料来看,后者更像是地方人物志。如李昉《太平御览》卷四二二《人事部》六三载:“刘彦明《敦煌实录》曰:‘童巽,字文举,学有才,太守京兆凉举巽上掾,历主簿、功曹。凉卒官,巽衰经送丧,道遇寇虏,众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呕血,贼欲破棺,巽叩头救请,头破流血,贼义而释之,由是显名。’”同书卷五一二《宗亲部二》载:“刘彦明《敦煌实录》曰:汜固,字孔完,大将军掾纯之孙也。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于是三府竞辟,皆不就。”清代张澍所撰《续敦煌实录》,便是一部完全的地方人物志,似乎说明《敦煌实录》中所载纪传并非实录中的人物附传。

唐代魏徵等人似乎倾向于“萧梁起源说”,在其所主持修纂的《隋书·经籍志》杂史类中著录了《梁太清录》八卷、《梁皇帝实录》三卷和《梁皇帝实录》五卷三书,以及在霸史类著录了《敦煌实录》十卷一书。然就其倾向来看,他偏向于以萧梁实录为实录体史书。五代刘昫等基本上承袭魏徵的观点,在其所修的《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从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开始著录,一直到唐吴兢的《中宗皇帝实录》。对另一部拥有实录之名的《敦煌实录》则将之列为第十类杂传中,“褒先贤耆旧”,看来是把《敦煌实录》当作先贤传记类著录,而未当成实录体史籍。北宋欧阳修等人也肯定魏徵等人的萧梁起源说,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第五类“起居注”中专立“实录”一目,先著录周兴嗣、谢昊二人各自的《梁皇帝实录》及《梁太清实录》之后,再叙录从《高祖实录》到《武宗实录》的唐代列朝实录。这种倾向,直到南宋初郑樵那里,都还在坚持。其所撰《通志·艺文略》与欧阳修一样,在史部的“起居注”类下专立“实录”一目。他否定王尧臣“实录起于唐代说”,仍从《梁皇帝实录》、《梁太清实录》开始著录,直到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五代《周世宗实录》,共叙录了38部实录。南宋孝宗时人高似孙的观点与郑樵差不多,在所撰《史略》中专立“实录”一目,将实录体史著分为六朝实录(梁实录)、唐实录、五代实录。看来也属于“萧梁起源论”者。高承在《事物纪原》卷四《实录》中指出:“三代之王有左右史记其言动,汉武有《禁中起居》,明帝有《起居注》而无名实录者。《唐·艺文志》所载《实录》,自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为始,则其事自兹以为始也。”

刘知幾等人认为实录起源于唐代。他指出:“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

^① 刘知幾:《史通》卷一〇《杂述》。

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元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与自立编年体,号为实录。迄乎三帝,世有其书。”^①然而,唐以前的实录怎样解释,刘知幾另有说法。据《史通》卷一二《外篇》针对北齐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一事,认为是“惟记行师,不载他事”。看来,刘知幾认为,陆氏《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不属于实录体史著。北宋王尧臣也持实录起源于唐代说,在其主持的《崇文总目》中指出“实录起于唐世,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后兵盗相交,史不暇录,而贾纬始作补录”。^②于是,他只从《唐高祖实录》开始著录,而省略了萧梁时的《梁皇帝实录》等。南宋孝宗乾道间的晁公武也称“实录者,近起于唐”,是“杂取两者(指编年与纪传——笔者)之法而为之”。^③可见,晁公武也是持此说的。

南宋末马端临似乎是依违于“萧梁说”与“唐代说”之间。他在引用晁公武前论时增加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实录者,近起于唐,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④,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引用时则称:“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⑤两相比较,知晁公武没有“名起于萧梁”之说,马端临加入这句话,表明他对于实录起源于萧梁,还是有些认同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完全否定唐代说,在《经籍考》的著录中仍沿用晁公武的做法,仍从唐代实录开始著录,未将萧梁实录列入起居注类的实录目中,甚至在《文献通考》中根本没有著录。

笔者认为,实录体的起源当以萧梁说为允。萧梁(502—557)时期,是中国实录体的草创时期,当时并无具体的书名,一般只称为《皇帝实录》。萧梁时期周兴嗣撰成的《梁皇帝实录》之“梁”字,似是后人所加。据唐修《梁书·周兴嗣传》载:“兴嗣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王应麟《玉海》卷四〇在著录梁实录时指出:“《唐志》:《梁皇帝实录》,周兴嗣,二卷(兴嗣撰《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⑥括号内原为双行小字的自注,表明周兴嗣所撰的实录初名只是《皇帝实录》。这与北朝史家所

① 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外篇》。

② 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三“实录类”。

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

④ 同上。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一八·史》。

⑥ 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实录》。

撰的《皇帝实录》是同名的。北齐(550—577)时陆元规著有《皇帝实录》。据《史通》卷一二《外篇》称:“高齐史:天统初……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这表明最初的实录基本上属于编年体,至唐则杂取编年纪传之法,成为固定格式的实录体史书。

实录体从时间上说是起源于南北朝的萧梁,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实录体又起源于何种史体呢?钱茂伟认为实录源于起居注^①,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善。事实上,起居注这一史源,对于历代实录来讲,是极不稳定的,不少朝代都是在没有起居注的情况下修纂实录的。

笔者认为实录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起源,难以一概而论。从不同的地区而论,实录体在南朝萧梁政权那里,属于双源并出:其一是起居注^②,其二是传记。此即王应麟所说的实录是“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③。据《史通》卷一七《杂说中·周书一条》自注云:“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见于……裴政《太清实录》。”表明王褒等人在《太清实录》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而这种集中的记载一般就是传记。^④而在北朝高齐政权那里,陆元规的《皇帝实录》便直接起源于起居注。该著是他在当中书侍郎“从文宣征讨”时,“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而成的,显然是一部类似于起居注的实录著作。

从不同的阶段而论,实录体在唐代宗之前源于起居注(及其替代者时政记)和纪传,而唐德宗以后,实录在继续接受起居注(或时政记)、纪传的源头活水的同时,又接受了新的源泉,那便是《日历》和原始档案。唐太宗时因为不能随意看《起居注》,便令房玄龄等删《起居注》而成《太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此时实录尚直接导源于起居注。至武则天长寿二年,姚璹开始奏请修撰由宰相记录的类似于起居注的《时政记》,实录仍然有类似于起居注的体裁为其依托。到德宗时,贞元年间,贾耽、齐抗曾修《时政记》,但贾耽罢相后而事废^⑤。宰相、监修国史韦执宜又奏请编撰《日历》。《日历》记录的是国家大政大事,不限于皇帝的个人起居。实录体史学的面貌从此为之一变,使实录从起居注式的皇帝私史,一变而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史。唐张九

① 钱茂伟:《实录体起源、发展与特点》。

② 周兴嗣修过《起居注》,又修《皇帝实录》,后者便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撰成的,反映了实录起源于起居注的事实。

③ 《玉海》卷四八《艺文》。

④ 参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第92页指出:“实录体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纪传体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⑤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09页。